

中国农村工业的私有化与收入不平等的增加：来自山东和江苏的证据

董晓媛*

摘要 这篇文章使用基于回归对不平等的分解方法和2000年在山东和江苏省进行的员工调查,分析了乡镇企业私有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私有化后的乡镇企业中,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不同程度的增加:员工间所有权分配份额不平等、对人力资源回报的增加以及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等。

关键词 私有化, 不平等分解方法, 收入不平等

一、导 言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工业经历了激进的产权改革,成百万的乡镇企业被私有化。尽管各个地方改革的方法和速度差异较大,但是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主要是通过把所有权从地方政府向企业内部人员即经理和员工的转移来取得的。和其他的转型经济一样,乡镇企业私有化的目标主要是增加经济效率;然而所有权的重组有重要的分配影响。研究表明,转型经济的私有化经常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加(Aghion and Commander, 1999)。不平等的上升导致社会紧张,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从山东和江苏省获得的一组数据分析了乡镇企业私有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私有化可能通过两个渠道来影响收入分配。第一个渠道是,伴随着集体企业的消除,公共财富从地方政府再分配到个人投资者。我们的实地调查表明,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导致了所有权在管理层的高度集中和股权在员工中的不平等分配(Dong, Bowles and Ho, 2002)。由于在私有化后分红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预见所有权份额的不平等将影响员工间的收入分配。私有化影响分配的第二个可能的渠道是私有企业工资制定行为的变化。由于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将利润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因此伴随着人力资本回报的增加和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工资不平等将可能发生。

不同类型的收入不平等对资源配置有不同的影响,因此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对于合理的收入政策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回报的增加可以看成是熟练劳动力稀缺的一种反映,因而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伴随物,然而性别歧视的增加导致的不平等上升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合理的。在这篇

* 温尼培格大学经济系。通信地址: Xiao-yuan Do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B 2E9; 电话: (1-204) 7869307; Email: dong@uwinnipeg.ca。这篇文章是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2002年7月11—12日召开的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准备的。产生本文的研究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变化项目的一部分,研究的完成获得了加拿大渥太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我希望感谢项目的合作者 Samuel Ho, Paul Bowles 和 Fiona MacPhail 为这篇文章所做的贡献。

文章中,我们用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方法分析了私有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我们发现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明显上升,员工间所有权份额的不平等分配、对人力资本回报的增加和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篇文章的结构如下:下一节提出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数据的总揽,第三节描述私有化过程的一些主要特征和讨论在样本县中私有化的分配结果。第四节提出收入回归和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的结果。第五节是简短的总结。

二、数据和样本县

文章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我们1999年和2000年在江苏省和山东省做的实地考察。两个省在90年代后期激进的产权改革前都是集体乡村工业发展的领导者。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产量和就业增长的放慢、以及来自私有企业竞争的加剧,地方政府遵从国家政策,在1996—1998年期间对他们大部分乡镇企业实行了私有化(Ho, et al., 2003)。从这两个省获取的样本,我们了解了在乡村集体工业的腹地私有化是怎么发生的。

表1. 样本的描述统计量

企业的特征		股份持有的百分比	
企业数	39	经理	52.6
就业	241.8	其他董事会成员	24.9
(员工)	(135.2)	员工	17.9
资产	1,374.6	当地政府	2.9
(10,000元)	(1,590.8)	其他	1.7
员工特征			
男性	0.587	教育	9.08
	(0.493)	(年)	(2.19)
经验	9.2		
(年)	(5.6)		
样本员工比重(%)			
蓬莱, 山东	0.36		
兖州, 山东	0.33		
武进, 江苏	0.31		

注:在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差。

我们实证分析的数据是使用问卷方式从45个企业和超过1000个工人中(主要是生产工人,也包括一些技术、销售和中层管理人员)收集得到的。¹ 样本企业坐落在三个县内,13个在山东蓬莱、14个在山东兖州、18个在江苏武进。尽管三个县都在全国和各自省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然而三个县的

¹ 由于没有当地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乡镇企业调查的,因此这里的企业是从当地乡镇企业局提供给我们企业名单中挑选的。每个企业的员工名单是在如下的约束下从工资表中随机挑选的:(1)挑选的员工中必须有五个是中层管理或技术人员;(2)挑选的员工在所有权改革前后都必须在企业工作。

收入水平却很不相同，武进最高，兖州最低。所有的企业都从事工业生产，大部分生产轻工业品。在进行这个调查的时候，有39个样本企业已经私有化，6个仍然为当地政府所有。在39个私有化的企业中，2个在1994年被私有化，17个在1996年被私有化，17个在1997年被私有化，3个在1998年被私有化，所有的企业都被卖给企业内部人，即经理和工人。企业数据包括所有权结构、企业大小和获利能力等信息。员工数据从每个企业的大约25个工人中收集，包括了若干变量，如从企业以工资、奖金、利息和分红形式获得的收入、所有权份额以及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状况和工作经验。有关收入的数据包括改革前与改革后的。² 这篇文章的分析是根据39个私有化企业的数据。表1提供了与实证分析相关的企业和个人特征的汇总统计量。

三、私有化与不平等的增加

我们通过和企业经理以及三个县的县、镇、村级地方领导的访谈收集到关于私有化过程的信息。从这些访谈中，我们发现三个县的领导都关心经理的激励问题，因而乡镇企业私有化的主要经济目标是使经理成为私有化后企业的主要所有者（厂长持大股）以便给经理人员足够的激励。每个县都有强烈的愿望迅速地使乡镇企业私有化以防止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和管理人才的损失。乡镇企业私有化一般在两年内完成，第一年集中在镇级企业，第二年在村级企业。

为了达到将乡镇企业资产转移给企业经理的目标，私有化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将企业完全地卖或转让给它的经理，或者经理领导的一小部分高级员工。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私有化小的企业。企业资产净值由当地政府的评估机构评估，一般要求经理支付评估值的70—90%。实际的购买价格通常是通过买者，一般是原来的经理和地方政府的谈判来决定。少数的情况下，价格是公开拍卖来决定的。一般是三年分期付款。

第二种方法叫做“先售后股”，销售企业给一个法人，这个法人一般是原来的企业经理，他再将企业重组成为一个股份制企业。这种方法用于私有化部分大一些的企业。为了吸引买者和确保迅速的销售，企业净值中高达30%的股份被“免费分配”。这里的企业净值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镇政府的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尽管这个值也要受到谈判的约束。然而，免费的股份仅仅分配给哪些也购买了股票的人。换句话说，企业的购买者获得30%的折扣。企业经理负责筹集企业净值的其余部分的资金，通常也是三年内分期支付。因此，企业经理能够根据自己的资金状况和企业的资产来决定自己购买多少股份，卖多少股份给别人以及卖给谁。然而，经理通常和地方政府商量决定或共同决定这些问题，尽管政府的参与程度在三个地方各不相同。

当股份被卖给员工后，免费的股份通常是依据购买的股份按比例来分配的。为了给管理和技术人员更大的激励，我们获知购买的股份，由此免费的

² 企业数据是从企业档案中获得的。然而，过去几年的员工数据是根据员工的回忆。由此它容易错误。我们能够用前几年的企业工资表的数据和我们的数据比较，根据这个比较，我们确信我们的数据是比较准确和可靠的。

股份是按照配额分配的,高级经理、销售和技术人员允许购买比生产工人更多的股份。在许多企业,外来工人没有资格购买股份,在一些企业,当地的工人也没有购买股票的机会。经理可以分期付款购买股份和使用企业经营资本和留存利润获得购买股份的资金。和经理不一样,其他员工通常被要求付现金购买他们的股份,他们一般通过个人储蓄或从亲戚朋友处借款来获得资金。在一个企业,股份被分配给工人来补偿拖欠工人的工资。

这些剥离方法的结果是,三个县的乡镇企业的私有化都导致了股份在经理层的高度集中。调查的45个企业中,39个被私有化,6个仍然是政府所有。在39个私有化的企业中,只有19个企业股份卖给了他们的员工;33个企业的经理或者管理层,即经理加其他董事成员,持有50%或更多的股份;员工是主要的股东的企业只有6个。对于所有的39个私有化的企业,77%的股份由经理和其他董事成员持有,17.9%由员工持有,2.9%由当地政府持有,1.7%由企业外的私人投资者持有(见表1)。

股份所有权的分配反映了这样的事实,鉴于经理人员稀缺以及地方领导的目标,地方干部和企业经理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乡村企业的工人则处于弱势地位。乡村企业的工人缺乏国有企业工人所具有的组织能力和历史特权,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因此,工人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得较少的企业股权就不足为奇了。

样本中的私有化企业约有三分之一确实给了员工购买股份的选择。然而,这些企业员工的股份所有权的分布经常也是高度不平均的。表2介绍了员工股权的描述统计量,员工股权的样本是从企业样本中只拥有私有化企业17.9%的股权的哪部分员工中获得的。³正如表中所体现的那样,样本员工中约有三分之一持有一些股份。对于所有的员工,股权的平均值是3812.8元,对于员工股东,平均值是11649元。基尼系数和各自的平方差系数反映出很大的分配不平等。员工股份持有分布向男性、当地居民、管理层和有钱的人倾斜。在1998年大约75%的股东拿到了分红。股份的回报率相当的可观,拿到分红的股东的回报率是11.6%,样本中的所有股东的回报率是8.6%。由于高股份回报率,股份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变成了在私有化后的乡村企业中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

私有化的企业在企业目标中更加重视利润,因此所有权的重组也导致了企业用工和工资行为的显著变化。和其他地方一样,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伴随着职工人数的大量减少。在39个私有化的企业中,20个企业解雇了工人,平均减少比率是现有职工总数的31%。两类工人通常是裁减的目标。首先,主要由妇女担任的行政类工作的削减相当的高。第二,几个企业告诉我们,“老、弱、病、残的人员被解雇了。”这种劳动重组的模式,将压低妇女对男工的相对工资水平和扩大不同年龄组的工资不平等。而且,许多企业采取措施进一步强化报酬和单个工人的业绩的联系。⁴这些措施有可能会增加具有不同生产力特征的工人的工资差异。

³ 对于员工股份所有权决定因素的分析,参阅 Dong, et al.(2002)。

⁴ 有的企业引入了非常原始的劳动纪律形式。例如,一个当地的干部赞许地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是如何增加生产力的。这个企业引入了“末位淘汰制”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每年对所有员工的业绩排名然后解雇最后的5%。这个排名是根据员工对相互之间的业绩的评估,车间主任的评估和一套对矿工和产品质量的度量得出的。

表 2. 整个员工样本股份所有权分布

	总数	股东	非股东
员工人数	883	289	594
(%)	100.0	32.7	67.3
股份平均值(元/员工)	3,812.8	11,649.0	0.0
标准差	17,402.9	28,912.1	-
最小值	0.0	500.0	-
最大值	320,000.0	320,000.0	-
CV2	20.83	6.16	-
基尼系数	0.874	0.615	-
股权的组间差异			
(1)	男性	女性	男女比例
均值(元/员工)	5,440.6	1,638.1	3.3
(2)	当地居民	移民	当地人与移民的比例
均值(元/员工)	4,024.9	500.0	8.0
(3)	管理层职员	生产工人	管理与生产工人比例
均值(元/员工)	7,605.8	2,339.8	3.3
(4)	家庭收入最高的 20%	家庭收入最低的 40%	最高的 20% 与最低的 40% 的比例
均值(元/员工)	12,491.7	1,949.1	6.4

注：表中给出的统计量是从 39 个私有化的乡镇企业的员工调查中获得。股份的价值，分红和总收入是按照 1998 年的当年价格计算的。

在我们的样本中，私有化后工资不平等的上升是明显的。表 3 描述了私有化后不同性别、教育程度和年龄组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工资不平等的变化。⁵ 按照不同组的平均工资的比率计算，性别工资差距在扩大，在私有化后男女工资比率上升了 6 个百分点。专科以上的工人对高中毕业的工人，大专以上的工人对初中毕业的工人和大专以上的工人对小学或更低教育程度工人的差别上升了大约 15.6、20 和 26 个百分点。这些估计表明了对教育回报显著增加的趋势。50—60 年龄组对于 25—49 年龄组和对 16—24 年龄组的工资比率下降，而中年和年轻组工人的工资差异上升。因此对老年工人的经验的回报降低了，但是对中年工人的回报升高了，显示了私有化导致了对经验回报的非线性变化的结果。私有化也伴随着地区工资差异的扩大，三个地区间的工资比率在私有化后上升了一个可观的数量。

为了给出一个私有化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总体描述，我们在表 4 中给出私有化前后对总收入、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的均值和基尼系数。为了估计收入不平等变化的统计显著性，我们用 Jackknife 的方法计算了基尼系数的标准误差。接着，用 Shorrocks(1982) 给出的步骤按照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我们的样本收入统计量指出，乡镇企业私有化并没有导致收入的下降。事实上，在两个比较期间总收入上升了 25.3%，每年平均增长率为 8.5%。员工股权引入的一个结果是，财产收入份额即从股权获得的分红和利息从私有化前占总收入的 0.3% 上升到了私有化后的 4.8%，非劳动收入在解释总收入

⁵ 为了便于比较，重新调节的 1995 年数据将代表私有化前的年份，而 1998 作为私有化后的年份。所有工资都是按照 1990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价格平减指数是从 1999 年版的《江苏统计年鉴》(第 45—46 页和第 128 页)和《山东统计年鉴》(第 111—115 页)获得的。

表3. 工资结构的组间变化

工资和奖金	私有化前 (比率)	私有化后 (比率)
性别		
男/女	1.326	1.396
教育		
大专以上/高中	1.117	1.261
大专以上/初中	1.333	1.553
大专以上/小学	1.264	1.524
年龄		
50—60/25—49	1.359	1.104
50—60/16—24	1.714	1.446
25—49/16—24	1.261	1.308
地区		
蓬莱/兖州	1.272	1.343
武进/兖州	1.461	1.752
武进/蓬莱	1.148	1.305

注：这个表中给出的数值是两组间均值的比率。

的不平等时的相对重要性也从0.3%急剧地上升到8.9%。基尼指数表明在私有化后总收入和工资的不平等有相当大的上升。实际上,在从1995年到1998年的短期内,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显著的从0.255上升到0.295,上升了15.7%。由于两个时期的基尼指数的90%的置信区间并没有交叉,因此这一改变在10%的水平上统计是显著的。需要指出,基尼系数是从截取样本中获得的,高级经理的收入和下岗工人的收入并不在这个样本中。如果这些人也包括进来,基尼系数会增长的更多。我们已经描述了私有化后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加,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更系统的分析不平等增加的潜在原因。

四、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方法

正如第三节所表明的,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已经导致了股权的不平均分配,扩大了不同性别、教育和年龄组的工资差距,增加了地区收入不平等。我们现在运用一种基于回归的不平等分解方法去估计私有化后每个收入决定因素,如股权、性别、教育、经验和地理位置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正如Morduch和Sicular(1999)所指出的,这种基于回归的方法提供了在多变量的情形下量化个人和团体特征的一个有效、灵活和一般的方法。

(一) 分解步骤

分解步骤开始于一个收入等式:⁶

$$Y = X\beta + \varepsilon.$$

⁶ 分解步骤的细节,参见Morduch和Sicular(1999)。

表 4. 收入和收入分配

	总收入	工资和奖金	分红和利息
私有化前:			
均值 (元)	3,145.6	3,134.6	11.0
标准差	(1,784.4)	(1,785.4)	(78.7)
比重 (%)	100.0	99.7	0.3
基尼系数	0.255	0.255	0.980
标准误差	(0.009)	(0.009)	(0.004)
90% 的置信区间	(0.240,0.269)	(0.240,0.269)	(0.973,0.986)
伪基尼系数 (Pseudo-Gini)		0.255	0.205
比重 (%)	100.0	99.7	0.3
私有化后:			
均值 (元)	3,942.3	3,754.5	187.7
标准差	(3,034.8)	(2,912.5)	(566.1)
比重 (%)	100.0	95.2	4.8
基尼系数	0.295	0.286	0.877
标准误差	(0.014)	(0.015)	(0.010)
90% 的置信区间	(0.272,0.318)	(0.261,0.311)	(0.861,0.893)
伪基尼系数 (Pseudo-Gini)		0.282	0.554
比重 (%)	100.0	91.1	8.9

注：表中给出的统计量是从 39 个私有化的乡镇企业的员工调查中获得。对所有的企业私有化后的年度是 1998 年。使用的私有化前的年度是 1995 年的调整数据。收入变量是按照 1990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

这里 X 是一个 $n \times K$ 的解释变量矩阵，第一列定义为一个解释变量为 n 维向量， β 是一个 K 维的回归系数向量， ε 是一个 n 维的随机扰动向量。从这个收入等式，总收入可以写成个人和团体特征贡献的收入流以及回归残差和的形式，也就是对于所有的 i ,

$$Y_i = \sum_{k=1}^{K+1} \hat{Y}_i^k.$$

这里对于所有的 $k = 1, \dots, K$, 有 $\hat{Y}_i^k = \hat{\beta}_k X_i^k$, 对于 $k = K+1$, 有 $\hat{Y}_i^k = \hat{\varepsilon}_i$. 每个对于估计收入流不平等的份额的测量都能用如下公式来计算:

$$s(Y^k) = \frac{\sum_{i=1}^n w_i(Y) \hat{\beta}_k X_i^k}{I(Y)} \quad k = 1, \dots, K$$

这里， $w_i(Y)$ 是个人 i 在整个不平等中的权重， $I(Y)$ 是不平等指标。 $s(Y^k)$ 的标准误差是:

$$\sigma(s(Y^k)) = \sigma(\hat{\beta}_k) \left[\frac{\sum_{i=1}^n w_i(Y) X_i^k}{I(Y)} \right].$$

这个基于回归的分解步骤应用于私有化前后的基尼系数。⁷

⁷ 正如 Morduch 和 Sicular(1999) 指出的那样，尽管基尼分解不满足一致可加的特性，但“它到目前为止仍是这一学科中最流行的方法，它经常被唯一的使用”。

(二) 实证结果

实证分析从一个扩展的人力资本方程入手, 年收入看成是股票价值、学龄, 工龄(和它的平方)、对男工人的性别虚拟变量以及对蓬莱和兖州的位置虚拟变量的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按元计算的年收入——用线性形式测量以便利于不平等的分解。股权变量, 也按元计算, 只是在私有化后的方程才被引入。对私有化前和私有化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别进行收入回归, 表5给出了这些结果。股份价值引入收入方程或许造成了联立偏差。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 私有化后的收入方程用两步最小二乘法(2SLS)去估计, 两步最小二乘法使用年龄、婚姻和居住地作为工具变量。基于OLS和2SLS估计比较的Hausman检验不能拒绝零假设, 即股份价值与收入方程的误差项无关。⁸ 这样, 在表5中对两个时期的收入回归的OLS估计是无偏的和一致的。

表5. 线性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

	私有化前	私有化后
股权	—	0.051 (5.182)*
男性	729.63 (7.046)*	963.01 (7.210)*
教育	150.32 (4.175)*	254.0 (4.491)*
经验	35.42 (3.158)*	100.31 (2.882)*
经验 ²	0.43 (0.829)	-1.730 (-1.735)***
蓬莱	-375.57 (-3.018)*	-753.52 (-4.364)*
兖州	-1,186.21 (-8.701)*	-1,881.9 (-9.939)*
常数	1,397.78 (4.526)*	733.43 (1.163)
调整的 R ²	0.203	0.272
F-检验(零斜率)	36.94	48.05
P值	0.0	0.0
观察值	875	880

注: 表给出了线性收入方程的OLS估计, 括号中给出了t统计量。这个t统计量得自异方差一致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两端检验的显著水平为1%、5%和10%。

收入方程的估计证明, 股份在私有化后有平均5.1%的回报, 是总收入的显著的决定因素。对于其他的解释变量, 估计量在私有化后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 男女工人的收入差异从729元增加到963元, 整个均值增加了13.5%。教育回报从每学年150元上升到254元, 整个均值增加了2.6%。对工作经验的回报也上升了, 从每年工龄35元上升到了100元。私有化前, 收入单一的

⁸ Hausman检验的值是2.01, 它的p值是0.95。工具有效性检验值是1.76, 它的p值是0.99。

按照工人的资历增加。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在私有化后对经验的回报增加，但它的增长率是下降的。这样，对于一个在 16 岁参加工作的工人，在私有化前他的收入在退休时到达顶峰，但在私有化后的报酬结构下达到顶峰的时间是在 45 岁。私有化也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表 6 给出了私有化前后按收入回归估计的股权、人力资本特征和地区因素促成的收入流的基尼系数的份额。除了平方的经验之外，不平等成分的份额在 1% 的水平都是显著的。在私有化前，人力资本、性别歧视和地区分割总共解释了样本中收入不平等的 27.1%。在私有化后，这些不平等因素的份额全部上升了，教育增加了 2.5 个百分点，线性项的经验是 2.7，性别差距是 1，兖州与武进地区差异是 4。从股权获得的非劳动收入成为造成不平等的新的成分，在私有化后明显的占到了收入不平等的 9.1%。结果，被解释的收入不平等份额上升到了 41.4%。

表 6. 基尼系数的分解：估计的比例份额

	私有化前	私有化后
股权	—	0.091*
标准误差		0.017
教育	0.035*	0.060*
标准误差	0.008	0.013
经验	0.048*	0.075*
标准误差	0.015	0.025
经验 ²	0.014	-0.036
标准误差	0.017	0.021
男性	0.065*	0.074*
标准误差	0.009	0.010
蓬莱	-0.007*	-0.005*
标准误差	0.002	0.001
兖州	0.116*	0.155*
标准误差	0.013	0.016
解释的百分比 (%)	0.271	0.414
残差的百分比 (%)	0.729	0.586
总数	1.00	1.00

注：* 表示两端检验的显著水平为 1%。

五、结 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用中国农村工业的一个小样本分析了私有化的分配结果。我们的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私有化导致了在短短三年间员工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骤然上升。我们发现，股份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是私有化后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来源。观察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其他原因，我们发现了教育回报的增加、对中年工人工作经验回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和地区不平等的扩大。

尽管这篇文章的结果是基于一个有限的样本,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转型过程有着启发性的含义。虽然目前人们更多地关注城乡不平等的趋势和跨区域不平等的趋势,这篇文章的结果提出,正如在其他转型经济中一样,私有化也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平等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农村,当地政府的社会福利和再分配功能在改革后越来越难以维持,私有化进程造成的不平等很容易加剧社会的分化。很明显,社会需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来调节再分配。而且,正如在第三节提到的,地方领导对私有化方法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效率的考虑和管理激励的关注。然而,正如这篇文章的结果表明的那样,私有化的形式影响收入分配。因此,分配平等的问题必须在私有化政策的设计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改革不应该以创造管理激励的需要为理由将大量的公共财产无偿或廉价地转让给少数个人。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and S. Commander, "On the Dynamics of Inequality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9, 7, 275-298.
- [2] Dong, X., P. Bowles and S. Ho, "The Determinants of Employee Ownership in China's Privatized Rur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Jiangsu and Shando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2): 415-437, 2002.
- [3] 国家统计局,《江苏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
- [5] 国家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 [6] Ho, S., P. Bowles and Xiao-Yuan Dong, "Letting Go of the Smal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tizing Rural Enterprises in Shandong and Jiangsu."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9(4), April 2003.
- [7] Morduch, J. and T. Sicular, "Rethinking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9.
- [8] Shorrocks, Anthony F.,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Econometrica*, 1982, 50, 193-211.

Privatization and Rising Earnings Inequality in China's Rural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Shandong and Jiangsu

XIAOYUAN DONG

(University of Winnipe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rivatization of TVEs on earnings inequality using a regression-based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and an employee survey undertaken in Shan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in 2000. It is found that several factors have contributed, to various extents, to the rise of earnings inequality in the post-privatization rural enterprises, those being -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hare ownership among employees, increased returns to human capital, and widened gender wage gaps.

JEL Classification D63, O53, P32